

#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

齐树洁

(厦门大学 法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在环境法领域,放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立法的一个普遍趋势。为有效保护民众的环境权益,美国不断扩张环境诉讼原告资格,其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根据我国的国情,在环境法领域,应当尽快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和团体诉讼制度。

**关键词:** 环境纠纷;原告资格;公益诉讼;团体诉讼

**中图分类号:** D9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8003(2007)03 - 0047 - 06

**Subject:** The Expansion of Plaintiff's Standing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uthor & unit:** QI Shu - jie (School of Law,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area of environmental law, it has been a general trend in global legislation to expand the restriction on standing of plaintiff i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American law has kept expanding the standing of plaintiff i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ts experience deserves research and study.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th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raised by prosecutorial bureau and group litigation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urgently in the area of environmental law.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dispute; plaintiff's standing;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group litigation

社会的高度产业化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环境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认识能力的阶段性和理性的有限性,人类在发展社会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时候,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污染和破坏,由此引发的环境纠纷已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纠纷。据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环境纠纷一直保持在每年10万件左右,但是自1998年以后,环境纠纷数量呈现急剧上升趋势,在短短6年多的时间里增加了约4倍,2003年突破了50万件。

公益诉讼相对于保护私人权益的私益诉讼而言,是指一定的组织和个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作为对民众权利的一种司法救济途径,公益诉讼制度强调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制止来自社会强势群体的歧视、压迫以及

政府、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

在环境法领域,放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环境立法的一个普遍趋势。然而,近年来,我国民众对于空气被污染、旅游景点被破坏等行为提起的环境诉讼,大多由于“法无明文规定”而被法院驳回,或由于“空气和风景都不是个人的,个人对这些东西没有排他的使用权和所有权”<sup>[1]</sup>,而以起诉者败诉而告终。

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在2007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吕忠梅等代表再次提出了有关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建议,主张赋予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sup>[2]</sup>

## 一、环境诉讼的意义

尽管各种诉讼外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纷纷涌

收稿日期: 2007 - 04 - 15

作者简介: 齐树洁(1954 - ),男,河北武安人,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诉讼法教研室主任。

现,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及其混合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就诉讼方式本身以及环境纠纷的特殊性而言,作为一种最后的、最权威的救济途径,诉讼在环境纠纷解决中仍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优势。

#### 1. 诉讼本身的特点决定其优势地位

首先,诉讼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通过预设的诉讼程序,由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法官根据法律规则、结合纠纷的事实作出具有拘束力的判决,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相对于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而言,诉讼更具有权威性。当事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通过提起要求停止侵害之诉、排除妨碍之诉、恢复原状之诉、损害赔偿之诉和课以义务之诉,以获得司法救济。

其次,诉讼判决具有判例效应。在判例法国家,法官在诉讼中作出的判决对今后的同类环境纠纷案件和下级法院审理同类环境纠纷案件具有约束力,可作为今后案件当事人援引的依据;即使在不承认司法判决的判例效力的国家,判例对同类环境纠纷案件的审理也起着重要参考作用。

最后,环境诉讼通过对环境损害纠纷的解决,隐含着对各种与环境公益有关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为全体社会确立有关环境公益的行为指南,确认环境公益的价值,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推动既有环境法律的发展。在众多的环境纠纷民事诉讼的推动下,各国逐渐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为公害受害者提供司法保护的依据,如日本的《公害健康补助法》就是在四日市公害诉讼判决之后不久制定的。

#### 2.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也是环境诉讼优势地位的影响因素

鉴于环境纠纷的特殊性,环境诉讼相对于其他类型纠纷的诉讼也有其特殊性,在环境纠纷的解决中相对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而言,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

首先,环境诉讼的模式不仅包括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加害者对已经发生的健康或财产损害进行赔偿,在有些国家(如日本),还可以在损害将要继续发生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请设置除害设施或停止加害活动,<sup>[3]</sup>对受害人的保护更为及时。

其次,集团诉讼(class action)是环境诉讼的典型形式,它克服了仅凭个人的力量单独提起诉讼难以获胜、举证艰难等缺陷,不仅有利于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人,而且有利

于法院提高审判效率,符合诉讼经济原则。集团诉讼强调公众的参与,影响面广,对于防治环境污染与破坏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高环保机关的行政效率也具有积极作用。

最后,环境诉讼通过当事人适格的扩张、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延长诉讼时效等方式加大对受害人的保护力度,鼓励受害人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不过,尽管环境诉讼对于环境纠纷的最终解决具有积极的意义,随着我国开发利用环境与资源力度的加大,污染环境渠道的增多,社会变迁和利益冲突的加剧,环境纠纷层出不穷,传统的环境纠纷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逐渐力不从心,捉襟见肘,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缺陷,尤其是“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对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限制,已经成为受害民众请求司法救济的巨大障碍。在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这一问题上,美国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 二、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张

根据美国宪法第 3 条的规定,只有在存在“事实或争端”(case or controversy)的情况下,联邦法院才能对案件行使管辖权。许多重要的原告资格规则是联邦最高法院以司法判例的形式对宪法第 3 条进行解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传统上,原告资格的获得主要以其受到事实上的直接损害或者有受到损害的切实危险为前提。并且这种事实上的损害还被狭隘地界定在经济损害的范畴。另外,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联系、损害的可救济性(redressability),都是取得原告资格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联邦法院在审理民事纠纷时,程序上适用 1938 年生效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该规则第 17(a) 条规定,诉讼应当以真正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real party in interest)的名义提起。这意味着提起诉讼的人必须是根据实体法享有可申请执行的权利的主体。

从利益调整的角度来看,诉讼无疑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相互之间对抗的利益主张引发人们对现有利益格局的不满,并寻求运用诉讼的方式来改变利益分布的状态。利益冲突进入诉讼以后,居中裁判的法官根据各方利益代表的主张、抗辩以及提交的证据等来完成利益权衡和判断,并最终判决的方式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利益调整方案。为了保证这样一个关乎人们切身利益的再分配方案能够至少在

形式上获得公正的外观,就必须确保任何会受到法院判决影响的特定利益在诉讼过程中获得恰当的主张和代表。因此,为如何判断诉的利益之恰当代表设立一个标准便成为当事人适格理论重要的逻辑起点。根据人们普遍认同的理念,“理性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代表”,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的主张,便在逻辑上显得周延了。这么一种当事人适格理论模式的核心在于法律预先设定一个封闭式的利益保护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设定判断利益代表的严格标准,即只有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当事人才能构成诉的利益之恰当代表。在传统社会中,利益与利益主体之间往往存在着明确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就赋予了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上述利益与利益主体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在很多领域,利益分布呈现扩散性、模糊性的特征,利益对应关系也因此变得不明晰,甚至根本不存在法律预先明确、或者公认的利益代表。因此,旧有的将一个诉讼案件仅放在两个当事人之间进行考虑的框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利害关系人”理论主要从两个层面对原告资格进行限制:首先,该理论所设定的利益保护框架是一个封闭式的体系,仅限于实体法所设定的范畴,即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必须是在现有法律所设定的利益保护框架内的;其次,法律预先设定了一个严格的、普适的利益代表判断标准,即只有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当事人才能构成诉的利益之恰当代表。美国最高法院早期确立的原告资格规则也有类似的效果。因此,扩张原告资格的途径必然是从上述两个层面着手进行突破。

关于诉讼资格(standing)标准,最初法院拘泥于“法律权利”(legal right)原则,除非原告能够积极证明其受法律保障的权利已经或正在遭受损害,否则欠缺诉讼资格,即只有当法院认定原告在普通法上享有诉因(cause of action)时,才承认其诉讼资格。其后,面对日益增加的公益争执,法院将“法律权利”软化为“事实上的损害”(injury in fact),不再以法律权利受害为条件。<sup>[4]</sup>

传统的规则要求原告必须证明其利益受到事实上的损害,且事实上的损害还被狭义地界定在经济损害的范畴。而在哈德森风景保护协会诉联邦能源委员会(Scenic Hudson Preservation Conference v. Federal Power Commission)一案中,法官就

对“事实上的损害”做了扩张解释,认为起诉者只要能够证明其在美学利益、环保利益以及娱乐利益上的特殊利益受到了侵害就可以成为适格当事人。另外,在塞拉俱乐部诉莫顿(Sierra Club v. Morton)一案中,最高法院明确表示,环境保护团体只需就本组织或者本组织成员的特定利益受到侵害这一事实作出有力陈述(assertion),就足以使该组织获得原告资格。因此,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某一环境保护组织的成员向法院提交一份“宣誓书”,证明其某一特定利益受到侵害,则该环境保护团体就可作为其组织成员的代表获得原告资格。以上述案件为契机,传统规则所设定的封闭性的利益保护框架(局限于经济利益)被打破了,演变成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

联邦法院在扩张原告资格问题上的实践为公民诉讼(citizen suit)制度的实行奠定了基础。《1970年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of 1970,简称CAA)是第一次规定公民诉讼制度的联邦法律。该法第304条明确规定:任何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任何他人(包括合众国以及任何其它宪法第11修正案认可具有被告资格的政府机构)提起民事诉讼,只要其在指控中表明后者已经违反(假如有证据证明这种被指控的违法行为已经重复出现)或将要违反(A)本法规定的排放标准或限制,或(B)本法执行机构或某一州政府依据本法发布的命令。但原告必须提前60天通知美国环保署(EPA)、州政府以及其将要控告的对象。在《清洁空气法》之后,随后几乎所有的联邦环境法都包括了公民诉讼条款。尽管随后法律中的公民诉讼条款与《清洁空气法》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显示了它们是以《清洁空气法》304条规定为原型的,并且也遵循同样的原则。环境公民诉讼已发展成美国联邦环境法律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该制度的精髓在于公民为保护环境与促进环境法律的良好实施,可对与自身无实质利益关联的环境违法行为或与环境权益相关的争端寻求法律救济。公民诉讼制度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原告资格的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公民诉讼条款都使用了“任何人有权提起诉讼”这样的措词,这表明在公民诉讼制度中,法律不再预先设定关于利益代表的判断标准。<sup>[5]</sup>这样,法官就可以根据自身的价值判断酌情行使自由裁量权。下面的案例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在Friends of the Earth v. Laidlaw Environmental

Services 一案中,原告“地球之友”环保组织声称被告 Laidlaw 公司(一个污水处理设备运营商)超过许可的标准向南卡罗莱纳河(South Carolina river)排放污染物质。因此,原告依据《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的规定请求法院对被告发出禁令并对其处以民事罚款。作为原告方的环保组织向法院提交了其成员的宣誓书,该宣誓书声称被告的排污行为侵害了其进行捕鱼、游泳等休闲娱乐方面的利益。受理案件的法院认为这构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引人注目的是,在公民诉讼被提起之前,Laidlaw 公司为了达到阻止公民诉讼的目的而要求州政府对其提起诉讼。因为,根据公民诉讼条款的规定,只有在没有适当的联邦或州政府机构提起执法诉讼(enforcement action)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公民诉讼。但这种策略最终归于失败,因为地区法院认为州政府的诉讼并未“被勤勉地提起”(diligently prosecuted),因此,不构成《清洁水法》所规定的公民诉讼的法定障碍。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尽管按照法律条文表现出来的意图,政府机构应当比普通环保团体或者个人更能较好地代表环境公益,所以,政府机构的执法诉讼足以阻止公民诉讼。但是,在本案中,州政府的作为显然让法官觉得至少在这个案子中已不能合理地期待州政府会为了促进环境公益而采取足够有力的行动。因此,在利益代表权衡问题上,法官没有墨守成规,认为在本案中“地球之友”比政府能够更好地代表环境公益,并由此认可其原告资格。

### 三、美国经验的启示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超越法定权益范畴的新型利益(包括私益和公益)层出不穷,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新出现的利益类型无法及时被纳入到现有法律的保护框架内。当围绕上述新型利益产生纠纷时,尽管依照程序当事人的理念,利益主张者可以作为当事人被纳入到诉讼中来。但由于直接利害关系人原则要求正当当事人应当是实体法律关系的真正权利人和义务人,在新型利益尚未得到实体法确认的情况下,利益主体就无法成为适格当事人,实体意义上的诉权也就无从实现,更无法获得胜诉判决。然而,应当意识到,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已经不可能期待现有的实体法能够囊括全部有必要通过法律予以保护的利益,在基于诉讼利益就可以请求司法救济的情况下,不能否定某个利益主体提起司法救济的正当性。

这就需要通过司法活动肯定当事人正当的利益新主张,从而达到司法创设权利的目的。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当事人适格的衡量标准进行扩张。

上述美国法制的发展无疑暗合了诉的利益理论。从诉的利益这一概念发挥作用的途径来看,显然它体现了裁判者运用自由裁量权在司法裁判供给对象这一问题上所进行的利益衡量。并且,这里所设定的利益框架不仅仅局限于制定法所界定的利益保护范围,而是一个以现有法律所设定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基线向外辐射的一个多元利益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一方面法官须在既定的法律规则框架内寻求当事人所主张的权利依据。另一方面,法官又可以通过能动性司法,在社会出现新的需求而现有的实体法出现“权利空白”状况时,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之上运用解释运动来扩充诉讼程序的“张口”,赋予主体以新类型的诉权,使得社会当中出现的新型的、而且是必须予以保护但暂时未被现行实体法认可的利益进入程序中并予以积极评价,从而达到司法创设权利这样一种效果。<sup>[6]</sup>

这样,起诉者就得以以个体性的利益保护请求(往往是超越法律既定的利益保护框架且较容易被证明)为立足点启动诉讼,并借助于诉讼排除与其处于同一利益阶层的人们的扩散利益的侵害。在这样的新型诉讼中,诉的利益指向呈现出二元化的特征。比如,在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中,诉的利益首先指向作为起诉者的环境保护团体为其成员在美学、休闲娱乐利益上的损害寻求救济;其次,诉的利益指向其试图排除与其处于同一利益阶层的人们的扩散利益的侵害。但是,对于起诉者而言,为其某个成员的微不足道的美学利益或休闲娱乐利益寻求救济显然不是其真正的意图所在(如果诉讼的目的只限于此的话,则只需要由其成员自己提起即可)。诉的利益的第二个指向才是起诉者真正的意图所在(或者说这才是环境公益诉讼诉的利益的真正指向)。而环保组织以其成员的美学、休闲娱乐等利益受到侵害为由提起诉讼的主要理由在于,这样的主观性的利益损害较容易证明,且事实上其往往也只能证明这样的利益侵害存在。起诉者只是以此制造一个连接点来试图表明其与被告在法律利益上存在着真正的争点,并希望能够藉此获得原告资格来启动诉讼,如此,诉的利益的第二个指向便得以实现。

法院完全清楚起诉者的意图,它同时也意识

到社会需要这样的诉讼来推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法院主要考虑的当然不是起诉者个体性的利益保护请求是否属于法律既定的利益保护框架,而是起诉者是否具有围绕诉的利益之真正指向积极地进行交涉和有效地进行诉讼的意愿和实际能力。如果法院在后一个问题上能够得出肯定的判断,那么法院就完全可以通过扩张解释将起诉者新的利益请求(如美学利益、休闲娱乐利益)纳入到利益保护框架中来。

借助于上文的实践分析和理论抽象,大致能够得出这样的印象,即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新型利益不断出现,且利益分布常常呈现扩散性、片断性的状态,利益冲突的形态也往往不同于传统纠纷,这使得在法律中预先规定一种普适的、严格的利益代表判断标准来作为衡量当事人适格的基础,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各种类型的诉讼之间存在着法律属性的差异,由此必然需要依据它们各自特征来确定它们各自的当事人适格问题。这就需要在利益代表判断问题上,赋予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由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秉承一定的法律价值,遵循一定的法律规则,并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从而理性地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作出判断。

#### 四、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的扩张

20 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了公众的关注,欧美各国的环境法普遍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保护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环境权。根据上述分析,我国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的认定条件,已经不能再局限于《民事诉讼法》第 108 条规定的“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了,而应尽快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

就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而言,环境诉讼的主体还不可能一步扩大到一般民事主体,包括个人或政府组织等,不过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公益诉讼的模式即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方式,在已有实践的情况下,也许更为现实可行。待到条件成熟时,逐步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从环境问题的受害者扩大到检察机关,再到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和具有专业资质的其他环保组织,最终扩大到更为广泛的公众主体,赋予公民个人、社会团体、行政机关系部门、检察院及其他相关组织等

环境诉讼的主体地位。

##### (一)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比如法国,早在 1806 年法律就赋予检察机关在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有权为维护公法秩序而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凡是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民的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检察院都有权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除对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协会诉讼和个人诉讼有明确规定外,该法典还规定凡是在公共秩序受到危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代表社会”的名义,以“主当事人”或“从当事人”身份参加公益诉讼。德国也确立了行政诉讼的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检察官可以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可代表联邦或地方独立提起或参加行政诉讼。

当然,赋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环境纠纷都应当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社会、大众来起诉。在涉及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利益时,完全可以由这些直接利害关系人自己行使起诉权,在涉及不特定多数间接利害关系人的环境诉讼中,则可以由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在没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时的纯公益性环境损害情形下,检察机关则有权起诉。也就是说当涉及具体的利害关系人时,应把诉权留给具体的利害关系人,国家没有必要干预。检察机关本身的性质和职责表明它实质上具有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或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这种身份决定它应当充当公共利益的代表,具有对无人控告的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环境违法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从而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益不受侵害。

##### (二) 确立团体诉讼制度

随着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大规模的群体纠纷也随着发生。由于诉讼主体众多,依靠单一诉讼制度难以解决,共同诉讼制度也无能为力,集团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模式便应运而生了。学界通常把集团诉讼定义为: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为了集团成员全体的共同利益,代表全体集团成员提起的诉讼。法院对集团所作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集团成员具有约束力,而且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主体,甚至对那些根本料想不到的主体,也具有约束力,即将人数不确定的但各个人所具有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拟制为

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一人或数人提起诉讼视为代表整个群体的提起,判决效力扩及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它具有以下特点:其一,诉讼代表人成立方式简单;其二,诉讼主体无限扩大;其三,判决书效力的扩张;其四,救济功能强大。<sup>[7]</sup>集团诉讼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长足发展,最初因保护消费者权益而产生,现已被广泛应用到保护环境权领域。

不过,代表人诉讼虽然也涉及众多的当事人,但实际上诉讼主体资格的要求并没有放宽,法律要求众多的当事人必须是与被诉事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由于环境侵权的性质特殊,个体受害者缺乏对抗企业或行政机关的能力,而且环境争议和生活质量问题多属于团体性纠纷,因此可以依赖公民团体的介入,由团体代替受损害的个别人或多数人提起诉讼,以实现公益和私益的社会保护。现代社会注重个人权利,但个人权利的实现往往通过其所在的社会团体来实现。在环境诉讼中,国家、社会团体的公益和公民私益是统一的。法律可以明确授予环境保护团体以诉权,赋予其直接提起侵权之诉讼和不作为之诉讼的权利。团体诉讼制度实际上是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一个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sup>[8]</sup>

所谓团体诉讼,是指有权利能力的公益团体,基于团体法人自己的实体权利,依照法律规定,就他人违反特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或无效行为请求法院命令其终止或撤回其行为的特别诉讼制度。

#### 参考文献:

- [1]王颖.公益诉讼:环保官司解困之门将启未启[N].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2-05.
- [2]吕忠梅.应当重视研究公益诉讼司法实践[N].法制日报,2007-03-09.
- [3][日]原本尚野着.环境法[M].于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
- [4]汪劲,等.环境正义:丧钟为谁而鸣——美国联邦法院环境诉讼经典判例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8.
- [5]陈冬.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管窥[J].郑州大学学

团体诉讼是基于诉讼信托的法理建立的。现代社会,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团体,团体成员往往希望通过团体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因此,所有的团体行为最终可以归结为团体成员的行为。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的权利,赋予特定团体一定的起诉权,可以避免众多受害者提起大量的诉讼,而且通过整合大量个体的力量形成诉讼资源上的优势,可以达到积极而且经济的效果。因此,法律允许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的众多成员将提起诉讼的权利信托给该社会团体,由该社会团体提起符合其章程、设立目的的诉讼。最终的裁判是针对该团体及其被告作出的,有利裁判的效力及于团体的成员,产生“事实上的既判力”。团体诉讼相对于其他群体诉讼模式,具有如下独特的优势:(1)能够有效克服因适用代表人诉讼而带来的复杂的诉讼技术问题,如代表人选任、权利登记程序等。团体诉讼不具有代表人诉讼那样复杂的内部关系,诉讼结构比较单纯简化。(2)团体诉讼以团体作为当事人,其实质仍然是一对一的诉讼。因此,它既能够有效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又能够实现解决群体性纠纷的目的。(3)由于团体作为某一方面的专门组织,熟悉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由其参加诉讼,有利于及时收集、提供证据,协调众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从而尽快审结案件,平息纷争。<sup>[9]</sup>

报(社会科学版),2004,(1).

- [6]常怡,黄娟.司法裁判供给中的利益衡量:一种诉的利益观[J].中国法学,2003,(4).
- [7]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7-41.
- [8]肖建华.群体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1999,(2).
- [9]王忠山,伍红.代表人诉讼方式的制度完善[N].人民法院报,2006-02-06.

[责任编辑:王德福]